



正如地壳运动一样，理论界最富戏剧性的演进与巨变往往发生在某些方面几大理论板块交汇与碰撞的边界。

当“四大解放”——对性别压迫、种族压迫、阶级压迫与自然压迫的解放——理论终于走到一起时，其震撼力足于掀翻压迫赖以存在的整个理念基础。女性主义理论试图阐释对自然的主宰时，也将自己推向了一个必要而艰难的全新前沿。

走向生态文明丛书/主编 杨通进

[澳大利亚] 薇尔·普鲁姆德/著 译者/马天杰 李丽丽

# FEMINISM AND THE MASTERY OF NATURE

# 女性主义与 对自然的主宰



FEMINISM AND  
THE MASTERY OF NATURE

# 女性主义与 对自然的主宰

走向生态文明丛书/主编 杨通进

[澳大利亚] 薇尔·普鲁姆德/著 译者/马天杰 李丽丽

Feminism and the Mastery of Nature by Val Plumwood

Copyright: © 1993 by Val Plumwoo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7 by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原作者薇尔·普鲁姆德授权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出版发行。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任何形式抄袭、节录或翻印。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版贸核渝字(2007)第41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性主义与对自然的主宰/[澳大利亚]薇尔·普鲁姆德著;马天杰,李丽丽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4

(走向生态文明丛书)

ISBN 978-7-5366-8493-5

I.女... II.①普...②马...③李... III.女性主义—作用—生态学:哲学—研究  
IV.D44 Q14-0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21735号

女性主义与对自然的主宰  
NÜXING ZHUYI YÚ DUI ZIRAN DE ZHUZAI  
[澳大利亚]薇尔·普鲁姆德 著  
马天杰 李丽丽 译

出版人:罗小卫 丛书策划:刘玮  
责任编辑:杨亚平 责任校对:郑葱  
装帧设计:黄俊棚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科情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18 字数:250千

2007年4月第1版 2007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册

定价:3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8809955 转 800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走向生态文明》丛书编委会

丛书主编 杨通进(中国社会科学院)

丛书顾问 [美]Holmes Rolston(Colorado State University)

编委会主任 余谋昌(中国社会科学院)

编委会副主任 王耀先(原国家环保总局宣教司)

叶平(哈尔滨工业大学)

王国聘(南京林业大学)

编委会成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澳大利亚]Andrew Brennan(La Trobe University)

[美]Dale Jamieson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澳大利亚]Ferya Mathews (La Trobe University)

[英]Robin Attfield(Cardiff University)

王正平(上海师范大学)

王建明(苏州科技学院)

卢风(清华大学)

李培超(湖南师范大学)

苏贤贵(北京大学)

肖玲(南京大学)

余正荣(广东行政学院)

郁庆治(山东大学)

曾建平(江西师范大学)

韩立新(清华大学)

雷毅(清华大学)

谢扬举(西北大学)

ZouXiang ShengTai WenMing

CongShu

## 总序

《走向生态文明》  
丛书

20 世纪后半叶以来,一个幽灵在地球上四处漫游。这个幽灵就是生态危机。

20 世纪后期,特别是 90 年代以来,人类在全球范围采取了大规模保护环境的措施,试图赶走这个幽灵。但是,几十年过去了,这个幽灵不仅没有被赶走,反而像一个吃饱喝足了的吸血鬼,变得越来越庞大,越来越难以对付。

打开电视或收音机,翻阅手边的报纸或杂志,我们每天都会看到、听到或读到关于这种或那种全球环境问题的报道,例如:温室效应,物种灭绝,森林锐减,能源短缺,大气、土壤和水污染,有毒化学品污染,等等。

困扰全球的这些环境问题,也同样困扰着我国。事实上,由于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过去 20 多年经济又持续高位增长,因此,我国的环境所承载的压力比绝大多数国家都要大得多,我们所面对的环境问题也比大多数国

家严峻。长期的污染和破坏已使我国的生态系统变得非常脆弱。20世纪60年代以来,我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青海湖水位下降了3.7米,面积缩小了312平方公里,面临着变成死湖或沙湖的危险。举世闻名的甘肃敦煌月牙泉在20世纪70年代占地22亩,水最深处达9米,但目前水域仅有8亩,水深不足3米,如不采取措施进行抢救,30年后月牙泉将不复存在。长江目前也正在变成第二条黄河。这些都是我国生态系统陷入危机的重要信号。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的经济指标和其他许多社会指标年年都能超额完成任务,但是,环境指标却年年欠账。“局部改善,总体恶化”成了我国年度环境报告的惯用语。全球范围的环境状况也是如此。20世纪90年代以来,尽管各国政府(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都加大了环境保护的力度,但全球范围的环境状况却每况愈下。“局部改善,总体恶化”也成了全球环境状况的真实写照。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环境问题的症结究竟在哪里?

如果说过去50年多年环境保护的历史和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的现实给人类提供了什么教训的话,这就是:环境危机是工业文明的结构特征。工业文明的基本结构和运行机制决定了,生态危机是工业文明的必然产物。在工业文明的基本框架内,环境危机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工业文明的主流经济学认为,导致环境危机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产权不清和企业成本的外部性。因此,在主流经济学看来,解决环境问题的措施不外乎两条:自然资源私有化;企业的外部成本内部化。但是,生态系统是一个整体,我们根本不可能把有机的生态系统分割成不同的部分,然后分给每一个人;环境要素的边界与产权的边界也不可能正好重叠,使外部成本内部化的努力也会遇到许多难以克服的障碍。环境污染具有滞后性,政府和企业很难在企业开始营业前就准确地计算出清理该种污染所需的费用。不同企业看似微不足道的小污染合在一起,会产生累积和扩大效应;这种效应导致的环境后果很难评估。对自然物品的定价涉及代际偏好的比较问题。当代人给自然物品的定价难以反映后代人的意愿,这对后代人来说是不公平的。

把所有的自然物都加以定价,意味着把所有的自然物都当成可以买卖和替换的“资本”。这是对自然的严重曲解。

工业文明的政治理念难以给环境保护提供坚强的支持。工业文明的民族主义理念赋予了每一个国家独立管理国家内部事务的绝对权利。但是,许多环境问题都是全球性的,需要在全球范围采取共同行动。环境保护的世界主义诉求会遇到来自民族国家的强烈抵抗。代议制民主也会遇到来自企业和选民的压力。作为组织良好的院外压力集团,企业会对政府的环保立法百般阻挠。选民更关心自身的福利水平,对政府那种旨在关心遥远后代生存环境的动议往往不以为然。被选出来的所谓民意代表在行使权利时可能也会背叛选民的意愿,与各种利益集团同流合污。

现代科技是工业文明的助推器。技术的进步能够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延缓资源枯竭的速度。但是,20世纪后半叶以来,科技进步给环境保护所带来的潜在好处已经被人口暴增给环境带来的压力完全抵消了。不仅如此,经济学中的“杰文斯悖论”还告诉我们,某种特定资源的消耗和枯竭速度,还会随着利用这种资源之技术的改进而加快,因为,技术的改进会使以这种资源为原料的产品的价格大幅度降低,而价格的降低会进一步刺激人们对这种产品的需求和使用。事实上,环境问题不是纯粹的技术问题,单纯的技术进步不可能解决环境问题。环境保护是一项目复杂的社会工程,只有制度层面的综合变革才能有效遏制工业文明的生态危机。

工业文明的基本价值理念也不能完全与环保理念协调。工业文明的自然观是机械自然观。这种自然观把人从自然中分离出来,把自然看成一架没有生命、可任由人类拆解、重组和控制的机器。自然不是意义和价值的领域,只是一堆有待人类利用的资源。这种带有强烈人类中心主义色彩的自然观为现代人掠夺自然的行为提供了辩护。工业文明的价值观关注的是个体,它对互利和权利的强调很难为以代际平等为基础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伦理支持。它把幸福理解为个人感性欲望的满足,这导致了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的盛行。在这种价值观的引领下,人类根本走不出越陷越深的生态危机。

解决环境问题的希望何在？

环境主义者认为，在工业文明的基本框架内对经济运行方式、政治体制、技术发展和价值观念所作的任何修补和完善，都只能暂时缓解人类的生存压力，而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困扰工业文明的生态危机。只有实现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型，人类才能从总体上彻底解决威胁人类文明的生态危机。文明范式的转型，是人类走出生态危机的必由之路。

生态文明是一种正在生成和发展的文明范式。它是继工业文明之后，人类文明发展的又一个高级阶段。生态文明最重要的特征，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生态文明的经济模式是生态经济，这种经济把人类的经济系统视为生态系统的一部分，而不是强行把生态系统纳入人类的经济系统。生态文明强调人类整体利益的优先性，倡导全球治理和世界公民理念。在生态文明时代，科学技术不再是人类征服自然的工具，而是修复生态系统、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助手。突显自然的整体性及其内在价值的有机自然观是生态文明的重要价值理念。生态文明的价值观既关注人的权利（特别是普遍人权），更强调关怀与责任，倡导和谐与理性消费。

从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这是人类文明的重大转型。如果人类能够未雨绸缪，自觉地实现这种变革，那么，转型的过程就会少一些悲剧和代价。我们希望《走向生态文明》丛书能够为人们思考和探索生态文明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发，为生态文明的建设提供良好的文化氛围。

杨通进

2006年岁末



# Nuxing Zhuyi Yu Dui Ziran De Zhuzai

## 致 谢

如果要把感谢做到位,就不应该忽视那最基本却最容易被忘却的部分:地球。她给予我生命。除此之外,我还要感谢我的林中小屋,它给我每天所需要的激励与支持。没有这些,就不可能有这本书的问世。

我要感谢几位朋友、邻居、审阅者和同事,他们的支持、启发和激励让我难忘。艾莉森(Alison)和帕特里克·塞克斯顿-格林(Patrick Sexton-Green)、西蒙·克拉维斯(Simon Kravis)、肖恩·凯南(Sean Kenan)帮我进行了本书的准备工作,也在必要的时候借给我聆听的耳朵、建设性的意见和容身的房子(这是经常发生的事,因为我的林中小屋是太阳能发电的,而那里又常下雨)。我也感谢珍妮·贝尔弗雷奇(Jane Belfrage)、吉姆·切尼(Jim Cheney)、西蒙·富拉格(Simone Fullagar)、杰克·弗伦奇(Jackie French)、琼·格里姆肖(Jean Grimshaw)、苏·霍夫曼(Sue Hoffman)、肖恩·凯南(Sean Kenan)、布莱恩·马丁(Brian Martin)、彼得·麦格雷戈(Peter MacGregor)、丹尼斯·拉塞尔

(Denise Russell)、理查德·西尔万(Richard Sylvan)、米里亚姆·所罗门(Miriam Solomon)和卡伦·沃伦(Karen Warren),他们审阅了部分初稿,并提出了有益的评论。特雷莎·布伦南(Teresa Brennan)是一位出色的编辑,她的耐心与投入大大改善了行文的质量,省去了读者很多麻烦。我对她真是感激不尽。

在西方哲学的2500年历史之中,其参与者几乎完全是来自社会精英阶层的男性,他们总是认为生态学导向的女性主义这一议题与他们的哲学追求毫无关系,这显示了他们对自己和这个周遭世界的政治联系的批判性思考是多么不足,尽管他们标榜自己是在探寻终极问题的答案。在过去的20年中,一些不一样的声音浮出了水面,这是哲学传统中绝无仅有的现象,一群妇女不仅开始研究哲学,而且还从独特的女性主义立场出发,批判性地就妇女的不同地位进行了探讨。我要对这股新生力量表示我的敬意与感谢。她们的介入,不仅揭示了哲学经典中所隐藏的性别问题,也将新的议题与理论进路推向了前台,并把压迫的理念框架置于聚光灯下进行审视。对于女性主义来说,这一新的焦点既包括压迫的普遍性质,也包括其特殊性。正如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所说的:

作为一种解放斗争,女性主义必须成为那个旨在消灭所有统治形式的更大范围斗争的一部分,但又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我们必须认识到,男权统治与种族主义和其他压迫形式之间具有同样的意识形态基础。当其他压迫形式原封不动时,我们不可能孤立地消灭男权统治。(Hooks 1989:22)

# Nuxing Zhuyi Yu Dui Ziran De Zhuzai

## 早 言

正如地壳运动一样,理论界最富戏剧性的 1  
演进与巨变往往发生在几大理论板块交汇与碰撞的边界。当“四大解放”——对性别压迫、种族压迫、阶级压迫与自然压迫的解放——理论终于走到一起的时候,其震撼力足以掀翻压迫赖以存在的整个理念基础。在遭遇了其他压迫形式(如种族压迫与阶级压迫)和其理论解释之后,女性主义经历了重大的冲突、转型与丰富。当女性主义理论试图阐释对自然的主宰时,它将自己推向了一个必要但也艰难的全新前沿。这注定会是一个极富挑战与争议的前沿,因为自然的问题与性别的问题如此紧密地缠绕纠葛在一起。由于“自然”是一个相当宽泛且不断变动的范畴,并被各种不同类型的征服所围剿,如果要充分阐释对自然的主宰,势必需要从对其他压迫形式的阐释理论中汲取养分,并着手进行整合。

在过去 20 年里,生态女性主义不仅对社会运动贡献良多,而且也将妇女所受的压迫与自然所受支配之间的联系进行了系统的理论化。

在不同的版本中,它涉及了所有四种形式的压迫——性别、种族、阶级与自然。与此同时,生态女性主义也被刻板地认为是差劲的理论,被投以怀疑的眼光,并总是与现在被称为文化女性主义的流派相联系。我写此书的目的,正是要发展出一种可以被称为批判性的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分支,它不仅是与女性主义完全匹配的,同时也是强有力地基于女性主义的。

我相信,一种更好的理论可以大大增加生态女性主义的批判与分析能力,并使其成为更有力的政治理论工具,为一系列相互联系与合作的解放运动政治实践提供坚实的基础。我们需要一套整合的理论  
2 框架来同时批判对于人类的征服和对于自然的征服,也就是将自然纳入到已经扩展了的女性主义分析体系中,成为性别、阶级和种族之外的第四个受到关注的范畴。作为被女性主义理论忽视的一环,对自然的审视将极大地完善我们对于统治与征服的理解。

此书的另一个主要目的,是为女性主义的环境哲学提供一个坚实的平台。我将着力探究在多数环境哲学阐释中挥之不去的“男性在场”,包括许多深层生态学家的阐释在内。他们的阐释中经常保持了一种二元论动态关系,虽然这一关系总是被微妙的或难以察觉的伪装所掩盖。而我将展示,由一些女性主义论者发展出的基于相互性(mutuality)的伦理学和政治学,将有可能重构一种区别于以往的更进步的环境政治与哲学。以此为基础,我将进一步论述如何从政治及伦理的维度考量对待自然的方式。正是在这一领域,男性理论家们[例如卡什(Chase)1991]往往忽视了女性主义思想。当他们仍困陷于深层生态学和社会生态学之间艰难的“生态政治大辩论”,并任由这些问题持续地困扰和分裂绿色运动的阵营时,恰恰是被忽视的生态女性主义的“第三种立场”有助于解决这些争论背后的矛盾。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压迫的不同形式在西方文化中留下的痕迹,呈现出一张由各种二元关系织成的网。二元论的逻辑结构构成了把不同压迫形式联系起来的基础。本书第二章将对二元论展开新的分析,从逻辑的角度梳理这一概念,并揭示这样做的好处。而随后章节的论述将时时借力于这一分析。事实上,二元论对于许多哲学思潮和

女性主义思想都至关重要,但对它的论述却往往流于模糊。我对这一概念的论述将争取比前人更为连贯、完整和严密,并使得由它所支撑的政治与文化批评回到正轨。我认为,西方文化将人类-自然的关系处理为一种二元论,这解释了西方社会对待自然的许多问题和由此造成的环境危机,尤其是被建构为“外在”于自然的人类身份认同。对于二元论的细致分析,还将显示其特有的关于“他者”和“否定”的逻辑结构与古典命题逻辑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而后者恰是现代性的主导逻辑理论。我认为,古典逻辑学作为工具理性的逻辑学,正因为其接近于二元论,所以才会从其他多样的理论可能中胜出。此外,二元论的逻辑还为本来不同种类的压迫提供了一个共同的概念框架。 3

那些在女性主义和解放理论世界里漫游的“旅行者”,常常会迷失在“二元论之山”(Mountains of Dualism)那雾气氤氲的小径中,并被不时遇到的幽径和峡谷所吞噬。在这座山中,一条经常被涉足的陡峭狭路通往一个叫“逆反之洞”(Cavern of Reversal)的地方。在那里,旅行者们堕入一个上下颠倒的世界,但这个世界却令人奇怪地与他们所希望逃离的那个世界极为相像。被困的浪漫主义者们在这里徘徊,哀叹他们的放逐。同他们困在一起的还有不同部落的田园主义者、地球母亲主义者、高尚的野蛮人以及劳工族英雄们,他们的身份正是通过对统治阶层文化价值的简单逆反而得到定义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们找到了一条可以避开这个洞穴的道路,并且在洞外竖了一块“此地危险”的牌子,可是他们并没能找到一条穿越崇山峻岭到达应许之地的途径。更多的时候,他们只是在洞穴附近的“话语之井”(Well of Discourse)附近徘徊,愁容满面地盯着对面那深不见底而令人恐惧的“相对主义深渊”(Abyss of Relativism)发呆。通往应许之地的道路要穿过“肯定之沼泽”(Swamp of Affirmation)。那些小心且富批判性的旅行者试图艰难地摸索着通过这段险境,但结果不是掉入了“延续性海洋”(Ocean of Continuity),就是在“差异性沙漠”(Desert of Difference)之中晕头转向,不得善终。实际上,朝圣者通向应许之地的狭窄道路正在这海洋与荒漠的夹缝中间,需要同时提防延续性和差异性带来的危险。

二元论塑造了从古代到现代的西方政治图景。在这个图景中,自然必须被视为一个政治的范畴而非纯粹描述性的。它目前的状态是由西方文明的超级英雄主人公——理性——通过多重的排斥手段造成的,这位主人公的冒险和遭遇成为了西方思想史的主要内容。理性为自然提供了一个用来定义自身的对照,正如丈夫的概念定义了妻子、主人的概念定义了奴隶一样。在西方传统中,理性被建构为主人的优越领地,它将自然视为妻子或是次等的他者,代表的是被它剥离并踩在脚下的物质性、生理需求和女性特质。理性对自然的持续征服,催生了西方对于进步与发展的最初概念。但正如在其他父权再生产的语境中一样,最终是父亲劫夺了这个私生子的抚养权,并指引他在后续的发展中继续否认和诋毁母亲所扮演的角色。

4 我在本书中延伸出的一套阐释,试图将环境哲学与对理性及理性主义的当代批判强有力地联系在一起。这一批判在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哲学中尤为显见。由于西方传统的捍卫者(甚至包括它的一些小心翼翼的批评者在内)固执而恶毒地将对主流理性的批判描绘成是彻底拒绝所有理性的疯癫,因此有必要强调的是,这种批判所针对的,是以主宰身份(master identity)和与自然的对立为表现形式的理性,它并不意味着需要彻底摒弃一切形式的理性、科学以及个体性;正相反,这种批判包含了对理性的重新定义和建构,使它向非对立性和非阶层化的方向发展。通过揭示主流理性形式背后所隐藏的政治认同,政治分析的范围和力度都会得到显著的增强。

于是,不同形式的统治之间——从对人的统治到对自然的统治——就存在了一条概念的纽带。这就是理性对“主宰”这个范畴的定义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排斥(exclusion)。自然的范畴正是多种排斥与控制并存的场域。这些排斥与控制不仅针对非人类,同时还包括多个人类族群,以及人类生活中被视为自然的部分。因此,种族主义、殖民主义以及性别歧视主义就将种族、民族和性别上的某些差异特征归结为动物性的和身体性的,并以此建构了一种“劣等性”,作为一种缺失了部分理性或教化的人格而存在。正如范达娜·席瓦(Vandana Shiva 1989,1991)所指出的那样,不只是妇女的劳动一贯被“理所当

然”地归入自然的范畴,那些被殖民的非西方、非白种民族的劳动同样也是如此。所以,这些统治形式之间的联系,一部分是受机缘巧合和特定的历史条件影响,另一部分则是由某种内在的必然性所决定。这种必然性正是内在于统治的动态关系和逻辑,即自我与他者、理性与自然。

在这种语境中,被定义为“自然”也就意味着被定义为被动的、无力的和非主体的,是为处于“前台”的理性与文明的巨大成就(通常是由西方白种男性专家或企业家创造的)提供陪衬的、不可见的背景与“环境”。它同时也是一块无主之地(*terra nullius*),是一种没有自身存在目的和意义的资源,因而也就可以被那些看似拥有理性和智慧的人随意吞并,并可根据吞并者的目的被随意地想象和塑造。被定义为“自然”,同时还意味着被视为一个严格分隔的低等国度,受统治已是再“自然”不过,其合理性源于自然本身以及事物的“本性”。当这种启蒙运动以西方世界对待自然的标准方式被施加于人类时,它曾遭致广泛的反对和谴责(当然,面对边缘群体如妇女和殖民地人民时它被正当化了)。而西方文化刚刚才意识到,用同样的方式对待非人类的自然也是问题重重。 5

许多女性主义理论在理性的貌似中性的外表下发现了一种“男性在场”。而我认为,一个简单而纯粹的男性身份认同并非问题的关键,更值得注意的是一个在阶级、种族和性别压迫的种种语境中形成的多重且复杂的“主宰身份认同”,这种身份认同塑造了在西方思想中占统治地位的一些观念,尤其是那些涉及理性与自然的部分。对女性主义来说,对一种更复杂的统治者身份的认同是极为必要的。它将有助于避免重蹈简化论的覆辙。在如马克思主义这样的简化理论中,某一种统治形式被置于核心地位,其他统治形式则被缩减为处于从属地位,并会随着对“根本的”统治形式的服从而自动“消退”。文化所扮演的角色也是应该得到足够强调的,只有当我们挖掘出压迫那深藏于文化之中的深层结构时,才有可能解释为什么在持续的政治与经济变革中,统治仍能顽固地存在。

本书的第一章概述了女性主义与生态学女性主义的关系。第二

章则建立了我赖以分析二元论的理论基础。随后,通过重新审视西方理性主义传统,以及揭示柏拉图关于理性的论述中存在的各种“排斥”(第三章),本书对于理性-自然二元论及其所扮演角色的阐释将得到进一步支持。我认为,柏拉图理性-自然二元论中的许多元素在那些针对理性、人类身份认同以及死亡的现代理论进路中仍未得到消解。对于古代哲学的分析将把女性主义、生态哲学及生态女性主义之间在历史阐释方面争论不休的问题抛向前台:对妇女和自然的统治究竟何时肇始?是否如某些论者坚持认为的那样,所有的问题都源自启蒙运动和原子科学的诞生?

多种绿色思潮又通过对机械论的阐释加入了论争。在这些阐释中,机械论往往被等同于原子论。在第四章和第五章中,笔者的论述将集中于二元论而非原子论,因而可能会打破这些绿色思想中的传统认知。要打破二元论,就需要对被压迫和低估的自然进行重新肯定和重新定义。笛卡尔思想剥去了自然的意向性(intentionality)以及任何与意识活动相类似的特质,使得人们不可能仁德地对待自然。只有当自然的主动性及意向性重新得到承认,当人类身份被以一种不是脱离肉体的极端方式重新建构时,笛卡尔思想造成的巨大鸿沟,即有意识的人类和无意识的机械化自然之间的不可逾越的鸿沟,才有可能真正消失。这一理论进路意味着我的阐述将更着重依靠传统理论而非“新兴”科学,并且也不怎么依靠已经被过度使用的“整体主义范式”(Holistic Paradigm)。作为一种政治框架,后者本身存在的问题也不少。

在本书的后续章节中,对理性-自然二元论及其对人与自然关系影响的分析,被延伸到了对自我-他者、公共-私密、理性-情感等其他二元论形式的分析上(第六章)。我将展示为什么西方文化(现在是全球文化)如此机械化地对待自然,并剔除了它在伦理意义上的所有重要性。我也将探究诸多隐含的二元结构(自我-他者、理性-情感、普世-特殊)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同时,我们也将看到二元关系如何保留在了深层生态学这样的理论中间,尽管它声称已经摆脱了这种结构(第七章)。如果想要真正克服二元论,就必须同时认识到延续性与



差异性。这意味着既不把他者视为与自我完全疏离和断裂的,也不把它同化并成为扩大了自我的一部分。这些阐述与当代政治理论关系甚密,因为它总是在如何对待自我和理性这两个领域出现问题。

在这个危机四伏的年代,花费时间来发展一套理论似乎是一件奢侈之事。然而,如果我们不能理解目前的发展,不能认清西方在理性和自然关系上的种种缺陷,就无法逃脱这些陷阱,甚至有可能满足于一些换汤不换药的解决方案。当代人类社会与环境的危机深刻揭示了理性-自然二元论在文化中所处的核心地位。消解西方文化中错综复杂的各种二元结构已是当务之急。由铃木大拙(David Suzuki)等论者所提出的许多现代环境主义思潮,都反复宣扬人类即动物,并且像其他生命形态一样依赖于一个健康的生物圈。从表面上看,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这种不言自明的道理会遭到如此的抵触,并需要被一再强调。但是,正是由于西方文化的主导势力长久以来一直拒绝承认这种延续性与相互依赖,并将人类的身份塑造为只是偶尔才与地球产生些微联系,才使得这些观念在现代社会如此富有革命性。

即便我们已经具有了生物进化论的正规知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断裂关系仍旧深深根植于现代社会的深层观念中,因为有一种动态关系一直试图把对人与非人的统治压迫永远地稳固下来。我们必须想办法重构对于人类美德及身份认同的观念与实践。最早从古希腊时代开始,这些观念与实践就排斥那些被辱没的层级,例如女性特质、生理需求、物质性以及非人类的自然。千年之后,是让这个主宰的文化回到地球家园的时候了。这种回归已不仅关乎公正,也直接关乎生存。

## 一、生态女性主义的远景:困境与疑惑

在女性主义的众多乌托邦中,有一个反复出现的国度。在那里, 7  
妇女们休戚与共,并与周遭的自然世界和平相处;在那里,没有人与人之间或人与动物之间的等级制度,人们相濡以沫,关爱自然,大地与森林保持着它们原有的神秘、力量与完整性,技术、军事与经济的力量并